

产业组织规则博弈、协调与平衡

金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要:不同“域观”形态的经济行为主体共存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对世界经济秩序提出了规则改革的新要求,这就是世界进入“规则博弈时代”的大背景。技术变局挑战产业组织规则,产业技术格局的巨大变化使得产业组织政策和竞争政策必须考虑世界技术格局演变的重要影响。生态变局重塑产业组织规则体系。人类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但工业化形态正在发生巨变,“机器工业化”向“生态工业化”转变,规则博弈成为全球经济及不同国家交易行为的核心问题。在尊重国家规则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国际沟通,实现规则接轨和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协议,是当今世界规则博弈的主题。其中,产业组织规则的国际接轨调适协同,就如同是保证全球经济顺畅运行的轨道交通体系,发挥着最重要基础设施的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产业组织;域观经济;规则博弈;生态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22)01-0025-06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201025

从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看,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但却也在发生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和人类经济社会面貌,这是“地球村”演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时代。今天,工业化时代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将使人们的工业化思维和经济行为方式,以及产业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发生系统性的演变。世界正进入以“规则博弈”为主要特征的时代,而作为市场经济运行“基本法”的产业组织规则体系也将发生深刻变革。

一、市场经济进入“域观”格局时代

自20世纪中叶(1944—1945年)现代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以来,全球市场经济被想象或构想为一个如同微观经济学所定义的世界。从一定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具有要求经济行为微观化的性质。与此相应,“政治经济学”也转型为“经济学”。经济学即西方微观经济学,成形于美国,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之以其为基础的政治、军事实力),主导建构了现代市场经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在这个国际秩序系统中,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子般实体,各国经济开放,消除市场准入壁垒,从而微观经济主体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一个匀质市场规则空间中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促成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这样,在这个规则一致的匀质空间中,就既有完全契合于微观经济学所刻画的主题性质和行为方式的市场经济主体(在产业组织经济学中以“厂商理论”来研究),又有由这样的市场经济主体所构成的自由经济体系,从而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而各国的产业组织和产业组织政策都必须符合并维护这样的市场经济世界秩序。

作者简介:金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

但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经济格局并没有完全按照人们原先所构想的方向演化。就市场经济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制度而言,世界发展的大方向确如“正确”想象所料,但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微观”格局并未实现,即现代市场经济的格局并未完全微观化。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出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成功道路,中国也成为强劲增长的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市场经济格局已成为“域观”世界,即不同性质的微观经济主体(例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同组织体系和组织行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使得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空间变得多样化。不同“域观”形态的经济行为主体共存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对世界经济秩序提出了规则改革的新要求。这就是世界进入“规则博弈时代”的大背景。

在这样的“域观”格局时代,各国经济都是有其“特色”的,各国的规则体系也必然是有“特色”的。要求所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规则体系都必须完全同质化,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和客观现实。无论你是喜欢或不喜欢这样的“域观”世界格局,它已是无人可以改变的事实,所有的人都已身处于这个世界之中,却可能还完全不知或不愿承认。因此,如果按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念,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了;但按照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中国所建立和发展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按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模板塑造的市场经济。纵观世界,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可以有体现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全球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异质性的“域观”格局体系,如果强行要求其成为同质性的“微观”体系,则无异于削足适履。只有转变观念,才能认识和理解大变局的世界,让客观经济形态的“脚”穿进主观意识形态的“鞋”。

二、技术变局挑战产业组织规则

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尽管技术是一个受到关注的因素,但一般不在学术范式构架中予以独立地位,从而可以保持产业组织理论逻辑和产业规则体系(及产业政策思维)的普适性,不至于因难以处置的多样化技术因素,而产生特殊的结构性复杂问题,影响据此为理据的产业组织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因此,企业或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一般就不在产业组织规则和产业政策的系统性考虑之内,即假定国家间的技术水平差异不影响产业组织制度安排及政策实施的普适有效性和公平性。不过,产业政策理论也有一个现实性假定,即世界上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国家,前者技术水平高、经济发达,后者对其望尘莫及;相互间没有技术竞争,只有前者向后者的技术转移,即后者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对前者的技术模仿和引进。

但是,在如今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前所未有的现象,那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在迅速地逼近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所有产业统计门类中,中国都彰显出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及产业技术格局的完整性,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产业技术格局。作为一个技术水平曾经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国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产业发展路径和政策取向上一直遵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的产业政策,远居发达国家之后。彼时,发达国家觉得中国技术与他们的差距很大,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产业组织政策并未提出较大异议。但是现在的产业技术格局与以往已大不相同。特别是在生产制造环节,世界技术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虽然中国的大部分技术还处于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但是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和产业部门,中国已经能够开始同发达国家比肩竞争、一争高下,呈现赶超的态势。中国的技术水平迅速发展,不仅突出地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规模的显著提高,而且技术创新向科学领域甚至基础科学推进。在此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产业技术竞争中,这个原本由其主导的规则体系已经开始不利于他们,认为中国在“偷”它们的技术,“窃取”它们的商业机密,侵犯它们的知识产权。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违反技术进步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而国际规则确实也有必须与时俱

进、改革完善的必要。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审议中国的贸易行为时,有的国家认为中国违反了知识产权制度。其实,中国并没有违反 WTO 的知识产权制度,但有些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比 WTO 更加苛刻。就此而要求在遵守 WTO 贸易规则时,须以其他更高标准的自贸协议规定作为标准,显然不尽合理,中国没有义务遵守对其没有约束力的协议条款。但是,这也确实反映了 WTO 的有关规则需要改革的现实。

更具实质意义的是,产业技术格局的巨大变化使得产业组织政策和竞争政策必须考虑世界技术格局演变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一些领域的重大技术进步,例如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无人技术等,对传统的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竞争政策体系提出了挑战。而且,关于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关切也从效率至上、公平竞争向效率、公平和安全三个核心关切之间的权衡转变。在关系国家安全、个人安全(隐私保护)、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上,产业组织政策和竞争政策都面临如何权衡应对的问题。可见,在产业组织和产业竞争所涉及的“技术”规则上,其制度边界和政策边界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产业组织制度和产业政策的规则体系。

三、生态变局重塑产业组织规则体系

早期,人类发展几千年的“常态”是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物质消耗不多,人与自然相安而处,人类的生活处于自然状态,离生物原生态不远,即人类基本不进行物质形态的转换,以直接使用自然物质为主。直到工业化时代,世界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经济增长率来体现,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全球 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 0.1%,甚至更低,表征了物质工具使用和物质资料转换规模十分有限的社会生产状况。即使是作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中国,在其最繁荣的时代宋朝,年均经济增长率也只不过 0.5% 左右。进入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增长率加速到 1%~2%,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6%~7%,最高值甚至可以达到两位数。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速度成为被高度依赖的度量指标。一旦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经济的非均衡矛盾和运行困难都会凸显,人们就会因此而忧心忡忡。人类发展具有了“增长依赖”的性质。

而且,工业化时代的“增长依赖”还具有“资源依赖”的性质,即经济增长的实现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源的开发和投入。直至人口和物质投入、能源消耗等均不断“创造历史最高纪录”,达到工业化进程中的最高值,从“达峰”进而转向“中和”“持恒”“循环”状态,物质转换从大规模“消耗”状态,以及“资源”与“废料(垃圾)”的对立状态,变为资源“循环”“不灭”状态。那时,“增长依赖”和“物质依赖”的经济特征才会彻底消失。今天,全人类离“后工业化”时代还相当遥远。而资源环境失衡问题及人类生产活动对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凸显。这表明,工业化必须要有新方向、新作为。

在面临生态变局的新阶段,人类必须要有命运共同体意识,产业组织规则将作出重要调整。这不是由人类的主观智慧主导,而是生态变局下人类行为的适应性反应。各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和挑战具有全球性,人类不能再仅仅作为个体而“自由选择”,生态变局已发出警示。尽管“自由选择”可以是主观理想,但个体自由是受环境制约的。面对生态变局,人类必须合作应对、共同行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生态多样性和万物共存,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如大卫·爱登堡所感悟的,“只有当无数有机个体充分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每一个机会的时候,只有当千百万物种的生命相互关联彼此维持的时候,我们的星球才能有效运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就越安全。”^{[1]6}“地球现在面临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只有各国捐弃分歧,团结起来采取全球性行动才能应对。”^{[1]216}

当前,按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最重要的全球性生态目标就是碳达峰、碳中和问题,这是人类产业行为所导致的全球问题,必须通过产业组织和产业行为的变革来应对。生态变局向人类提出的挑战,正如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所指出的,“繁荣了两个多世纪的化石燃料文明,正使我们面临一系列气候变化事件和我们几乎理解不了的新现实”,“人类正经历着另一种大觉醒。在自然规律和模式变得与之前截

然不同的地球上,我们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物种,思考我们面临的共同命运。”^[2]

在过往约 300 年的机器工业化时代,“人类做出的每样东西,大部分若不是由碳组成,就是以碳的火焰打造出来。”^{[3] 153}“工业是生物与地质之间交互作用的一条强大的新途径。”^{[3] 228}“花了上千年时间才从富含矿的岩石中流出的可开采石油,人类只花了一个半世纪就烧掉了一半。”^{[3] 229}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减缓我们对碳循环的冲击,又不必牺牲工业化的火焰。”^{[3] 230}换句话说,人类必须从碳依赖逐步转向碳中和的可持续发展。

这预示着,大变局的深刻含义是,尽管工业化的本质没有变,人类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但工业化形态正在发生巨变,可以说是“机器工业化”向“生态工业化”的转变。就产业组织方式而言,“机器工业化”历史阶段的特征是,微观经济体被想象为就像是同质性的机械体,行为目标主要是追求“最大、最优、最强”的工具理性指标:销售收入、利润、GDP 增长率等。

进入新工业化时代,接受“生态工业化”理念,就要承认多样性的产业组织与多形态的文明并存,经济发展从单纯追求“最大、最优、最强”的产业行为目标,转向以“合适、适度、包容”等为生态性特征的产业组织行为和组织目标。总之,产业经济的政策思维越来越倾向于平衡持续目标,而且,必须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从生态工业化的观念来理解,产业组织和产业竞争行为将更具合作性、互利性和共荣性。“你死我活”“优胜劣汰”不再是产业组织和产业竞争的铁律,“做大做强”也未必是优胜者的唯一目标。大中小各具专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敌对”相依,总之,异质共生的多样性态势格局将成为产业组织和产业生态的新特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产业组织行为不再需要产业竞争,更不意味着产业竞争力不再是产业组织行为的工具性目标。产业公平竞争仍然是产业进步的基本经济动能,大变局只是意味着产业竞争和产业竞争力的实现方式和时代形态将发生重大变化。换句话说,产业竞争和产业竞争力的生态环境即“演绎舞台”已经今非昔比,“游戏”必须换个舞台和规则。人类归根结底是生态体系中的一个物种,无法脱离生态体系而为所欲为,“生态工业化”所要求的自律性和合约性(遵守协议),将成为影响全球产业竞争和各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在素质和特质规定性。

四、产业组织的规则主权与规则协调

如前所述,在世界大变局时代,产业发展的组织形态、技术格局和生态环境已形成大变局。产业组织呈现出规则体系高度复杂化、规则空间多样化态势,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世界产业运行的异质性规则空间如何实现接轨相容?如何实现和维护各国产业公平竞争?

过去想象的同质性产业规则空间已经不是此时的发展现实,实际上它从来也没有出现过。那么,具有各自特色的经济体和市场行为如何在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同场竞技、公平相处?如何与市场经济的普适规则相容?开放性和国际性的产业经济有效运行需要有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和规则空间。所以,尽管各国产业组织的规则有其国情特色,但也需要有全球产业组织和产业竞争的共同规则安排,才能实现各具“特色”的规则空间的相互接轨、挂钩、协调。尤其是考虑到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规则博弈成为全球经济及不同国家交易行为的核心问题,世界规则接轨的问题就更为重要。

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具有独特性的市场经济。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组织形态和规则体系又有许多不为局外人所理解的特质。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并且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这些国际自由贸易协定体系更加严格,在许多方面,中国如何与世界规则顺畅接轨,又面临很大的挑战,甚至困难。可见,产业组织规则的顺畅相容不仅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而且是中国产业组织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独特性问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经济制度,其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与世界接轨,必然会有一系列特殊问题。

中国产业组织规则的制度安排和深化改革,既不是模仿和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体系,又必须与其规则体系尽可能相容,以确保经济活动的可接轨、可合作、可公平竞争。这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改革创新使命和规则博弈磨合。进入新时代,全人类的利益相关者形成了紧密相连的网络体系,特别是在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进步中,将日趋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水乳交融。产业规则体系必须进行新的调适和平衡。

更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经济制度,产业组织是市场经济生产体系的核心。但市场经济并非如传统主流经济学所假设那样,是完全服从于经济理性的同质性制度安排,而有多样化的主体形态和主体行为差异,各国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也是丰富多样的。所以,要改变强求各国产业组织和行为规范必须一律同质的观念,尊重各国多元包容的制度安排,接受不同制度国家的多边共治世界格局。换句话说,在产业组织的制度安排上,各国合理合法地拥有一定的规则主权。特别是在国家的核心制度和规则特质上,各国拥有进行制度安排的国家主权。但是,各国的规则体系又必须是可接轨、相协同的,世界产业组织不能是一个碎片化的规则体系。

一方面,各国国情不同,市场经济形态各有特色,具有不完全相同的产业组织形态和经济秩序规则;另一方面,只要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各国产业同处于一个世界市场,不仅无法隔绝脱离,而且相互交易、利益攸关,交往中往往难免会发生摩擦甚至冲突。如果市场规则体系是“碎片化”“无序化”的,各国产业和各类企业如果各循各的理、各有各的道,不同国家和不同市场经济形态中的产业关系和经济行为就会出现规则标准“双重化”或“多重化”的无序现象,世界经济就难以形成整体格局,产业经济就无法顺畅运行。这就涉及不同国家的产业组织规则体系之间的对话理解、妥协接轨和公平相处的问题。所以,产业组织规则改革面临很大挑战,这成为制度重塑的艰巨工程。各国要进一步实现自身的产业组织规则秩序的有序化,对内实现能够适应具体国情的产业组织体制和产业竞争的市场规则,对外实现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产业组织秩序规则间的相容和对接。要认识到,在世界市场经济中,有些制度规则必须相同无异,并保证各国经济体一致遵守,避免因双重或多重标准而导致无序、冲突和不公平;但是,也要承认,有些制度规则因各国主权原则和具体国情有异,必然会各具特色,难以强求完全同质、一致。彼时,各国就必须通过积极对话,达成理解、通融调适,以保持和维护正常的全球秩序。总之,规则博弈和规则协调将是新时代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最深刻、最复杂的挑战。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经济最大的格局变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规模居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而且将毫无悬念地很快成为规模第一大的经济体。在新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特质的新兴国家产业组织规则,与发达国家主导形成的成熟市场经济规则体系实现相容一体,如果强求前者的行为完全符合后者的规范,那就像是要让年青一代与久经风霜的百岁老人进行行为磨合协调。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的主导者是西方(欧美)国家,跌宕变幻数百年演化至今,成熟而自傲。数百年形成的现代市场经济成熟规则有其产业组织行为和产业组织治理的一套基本原则,似已有其“正确”准则和众多“纠错”判例。例如,对于“市场垄断”“保护壁垒”“政府补贴”“竞争合谋”“主体歧视”“行政干预”“竞争限制”等妨碍市场有效竞争的现象,已有其产业组织理论上的传统定义和治理规程。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却仅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后来者当然要尊重历史和现行秩序,不可任意否定和颠覆。但是,无论先行者还是后来者都必须认识到,世界大局巨变的当今时代,尤其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变迁导致传统产业组织规则难以规范把握和有效应对,就像是已经难以再用一把久已用惯的直尺来度量形状复杂的立体物面。所以,改革是共同使命。而问题在于,如何改革?按怎样的理念和方案进行改革?

如何在尊重国家规则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国际沟通,实现规则接轨和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协议,是当今世界规则博弈的主题。其中,产业组织规则的国际接轨调适协同,就如同是保证全球经济顺畅运行的轨道交通体系,发挥着最重要基础设施的关键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大卫·爱登堡.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M].林 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2] 杰里米·里夫金.零碳社会——生态文明的崛起和全球绿色新政[M].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30.
[3] 埃里克·罗斯顿.碳时代——文明与毁灭[M].吴妍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责任编辑:金光敏)

Gam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ules

Jin B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economic agents of different domains and forms coexist in the world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reform of the rules of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This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world entering the “rule game era”. Technological changes challenge the rule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pattern mak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olicies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s technological pattern. Ecological changes reshape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ule system. Humanity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but the form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from “machine industrialization” to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game of rules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transaction behavior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n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rules, it is the theme of the game of rules in today’s world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rules and to form rules and agreements that are jointly abided by. Among them,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ules, adjustment and coordination, is like the rail transit system that ensures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most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Keyword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Domain Economy; Rule Game;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